

收稿日期:2025-08-24

礼仪文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 历史基础、理论价值及实践路径

杜宇涵,张 静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蕴含道德规范、社会制度、伦理精神等多个维度,在教化逻辑上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契合,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和指导思想。礼自身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能够引导人们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端处,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本体性预设,在现象学意义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为一种社会事实,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丰富联系,使得“社会”成为描述、理解、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礼能够在当今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发展寻求恰切之道。

关键词:礼仪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6-0009-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多向度社会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B-b/2024/01/110)。

作者简介:杜宇涵(2001—),女,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张静(1978—),女,湖北钟祥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心理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6.06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发挥礼仪制度的教化作用,丰富道德实践活动,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作用展开讨论,总结归纳礼在进行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时所呈现的教化内容与方式,试图将其作为教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少数学者立足传统礼仪文化本身,通过剖析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勾勒其思想政治教育图式,思考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还需要从教化机理入手,对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进行阐释,以探寻礼在方法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在此过程中,礼不仅能以自身鲜明的社会属性,引导人们回到思想政治教育发端处,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为一种社会事实,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丰富联系,使得“社会”成为描述、理解、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也可以

借助自身的现代转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发展提供启示,从而在意识形态教育层面建立一个关于礼的、一贯的、相对稳定的中国叙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一、历史基础:礼仪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和指导思想

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而言,还是就逻辑框架而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都经历了从礼器到礼制、从礼仪到礼义、从礼治到礼教的发展过程^[1],体现出礼在不同时代的规范化、制度化、义理化等社会化倾向。我们不妨借用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论对这一复合文化系统加以整体分析,归纳其凝聚社会共识、调节社会关系、维护政治统治等社会价值,将其看作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和指导思想,并揭示其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和区别。

(一)以仪式为表现的道德规范

从“礼”的古文字形看,“豊”是“禮”的初文,它是先民在遵循“乐莫重于鼓,物莫贵于玉”的祭祀理念的基础上,将鼓的象形初文“壺”与两串“玉”组合起来的会意字,表示一种行礼之器。“后乃以器名为事名”,“禮”成为“事神致福”的仪式,构成礼仪的初级形态与外在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变迁,礼从“事神”向“治人”转变,由原始宗教发展为复杂的社会伦理规则,要求人们在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寻求平衡,以获得丰收、平安与幸福。

仪式通常被视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且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2],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一方面,与专业化、组织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仪式并非是在学校、党政机关、军队等特定领域展开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活动,而是“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3]422},成为社会实践中的“道德日常”,体现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来看:其一,据《周礼》记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4],仪式起到维护政治秩序、巩固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其二,聘礼、射礼是重大的仪式活动,具有“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5]1223}的效果,规范着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其三,“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3]30}所提及的冠礼、笄礼、婚礼等都是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一个人生阶段迈向另一个人生阶段的重要仪式,彰显出人们的生命秩序;此外,乡饮酒义、月令、昏义、燕义等对人们的社交、农耕、宴饮等日常活动都有具体的程序安排。另一方面,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带有宗教色彩,但也能够展现一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引导人们理解并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冠礼为例,古人十分重视男子的成年礼,认为“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3]497},将其看作“礼之始也”^{[5]1177}。其中缁布冠、皮弁冠、爵弁冠等三次加冠,分别旨在告诫男子要在享有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中树立与名字相匹配的远大抱负,在保家卫国、驻守疆土中厚植爱国情怀,在祭祖敬神中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出封建社会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全社会在不自觉中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

(二)以礼治为核心的社会制度

西周时期,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来维护社会秩序,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民风民俗、仪式规范等进行整理改造,制定出一套处理宗法制下各种社会关系的典章规定,形成“宗教-政治-伦理”三位一体的礼制传统,初步实现礼由仪式性向制度化的延伸。到了春秋时期,统治秩序发生错位,“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要求统治者加快解决社会顶层设计中“何以为治”的问题。但“礼坏乐崩”并非是对礼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求人们重新思考礼的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为了回应社会失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通过“援仁入礼”来增强礼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将外在之礼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促使社会成员在内化礼所宣扬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走向社会化,自觉履行与自身角色地位相对应的社会职责,在“正名定分”中调和人伦关系、等级关系,营造出“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6]1292}的和谐氛围,促进礼向社会制度转化。那么,“礼坏乐崩”或许可被看作是一次社会变革,此后,礼治思潮兴起,统治阶级尝试以礼来建构社会,更加注重挖掘礼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礼治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礼也成为统治者所追求的理想制度模式。然而,与刑、法等外在强制性手段相比,礼对社会成员只是一种软约束,其治理的效果更多取决于人们的自觉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对此,持续不断的“引礼入法”催生出“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使得社会成员在“仁”所注重的自我约束与“法”所强调的外在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收获较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逐渐融入社会角色,实现“隆礼重法则国有常”^{[7]129}。

不难发现,在纵向上,随着社会变迁,礼之范围逐渐扩大,由祭祀之礼而及于人伦之各种规范,再而至于政教之典章制度^[8],由宗教性功能转为政治性、伦理性功能。从横向看,中国传统礼制的思想内核因社会矛盾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而不断更新,体现出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发展变化的不断调适^[9]。然而,中国传统礼制尽管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相比于社会主义社会下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具有阶级局限性。它所强调的宗法伦理是“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的具体展现,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破除的“历史枷锁”^[10]。对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理性分析中国传统礼制的历史价值,认识到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中国传统礼制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会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不可简单消极地对其加以否定。换言之,礼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特定经济政治制度和特定阶级服务的,是意识形态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反映实践的社会历史性。

(三)以礼义为内容的价值观念

“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11],礼仪与道德互为表里,它既表现为礼之仪,又体现为礼之义,是文与质相统一的文化行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跳出仪式规定的范畴而以观念的形式存在^[12],在“礼坏乐崩”中接受儒家学派的改造,理论价值得到进一步升华,逐渐从行为规范、社会制度抽象为一个与“仁”并列的道德范畴,沉淀为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13]。因而,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4],这是仪式及其所建构的礼制存在并延续的根本原因。

在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后,礼构成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教化的指导思想,渗透到修身、齐家、治国等各个方面,具有“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5]956}的效果。首先,古代先哲们将“礼法自然”作为制礼的根本原则,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6]1271},要求人们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践行礼制,彰显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次,“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5]1177},礼是一个人立身处世之本,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人们从养成“辞让之心”开始,在约束自身行为、与他人和谐相处、遵守社会规范中积小德成大德,形成厚德载物的理想抱负,达到“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7]9}的境界。再次,礼是立国安邦的重要因素,正所谓“国家无礼则不宁”^{[7]10}。无论是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15},还是荀子的“礼法并举”,都强调礼在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治理作用,是为政以德的主要手段。简言之,“礼之用,和为贵”^{[15]10},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要求人们运用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来处理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发挥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16]的教化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礼义为内容的价值观念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对当今思想政治教

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命脉,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内生资源。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7],两者因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在意识形态层面有本质区别。礼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宗法观念,被剥削阶级在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压迫下缺乏自主自觉的思想意识,只能被动地听从统治者的说教,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倡导平等自由,允许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价值取向进行科学评析和引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追求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统一。

二、理论价值:礼仪文化具有描述、理解、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礼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化逻辑上内在契合,且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我们不妨借助礼用社会学方法描述、理解及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完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价值性、实践性等特征^[18],在还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的基础上,促成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

(一)勾画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逻辑

从礼的文化结构与社会价值来看,其在器物、制度、精神等各个维度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尽管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礼与思想政治教育都遵循相似的教化逻辑,即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借助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将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传递给社会成员,促使其在增强价值认同、形成行为自觉中促进社会良性运行。而且,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一致、教育内容与方法相通、最终目标同向,因而礼能够勾画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逻辑。

第一,礼与思想政治教育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承载并传递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礼从一开始就是为凝聚社会共识、稳定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在其以原始祭祀仪式的形式出现时,便是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现。随着周礼的形成以及儒家学派对周礼的不断改造,礼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上升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旨在以“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来维系差序格局。概言之,礼与思想政治教育都致力于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统治地位。

第二,礼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选择上具有共通性。在教育内容上,以礼为核心的古代道德教育强调对人的德性的关注,社会成员既要修己达人,又要厚植家国情怀,不断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强化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继承了古代德育的优良传统,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主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引导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方法上,礼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因材施教、自我教育等方法,也都得到了较好的继承与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第三,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都在于构建和谐社会。《礼记·礼运》勾勒出“天下为公”的理想蓝图,向人们展现了“大同社会”的和谐氛围。尽管这一理想世界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其中既没有阐明封建社会的剥削本质,也没有找到变革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力量及具体方法,但这种理论的不成熟性是与阶级的局限性相适应的。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性在于,它能够为人们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促使一代代社会成员在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在接续奋斗中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逻辑在运行机理上内在契合,可将礼视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与指导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样态。由此,便能从“社会”视角完整勾勒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社会历史维度,跳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语境,让人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产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解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向度

礼不仅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化逻辑上相贯通,而且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其发生、运行、发展都与社会系统息息相关。从演进历程看,礼源于社会需要,并随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其以原始祭祀仪式为初级形态,在应对社会失范的过程中转化为社会制度,最终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运行方式上,礼以社会日常生活为育人场域,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作用对象,以社会个体和家庭为起点,主张在“正名定分”中实现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从效果上看,礼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规范言行举止、维护政治统治、传递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社会价值,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目的。

因而,礼能够以自身社会属性重新唤起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的关注,引导人们理解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础地位,承认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客观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19],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的还原。在这里,还原具有现象学维度,指的是跳出思辨性的逻辑推演,回归到事物的本来状态、初始面貌,回到关联着主体与对象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和辩证地理解事情之真实^[20]。因而,还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旨在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端处,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本体论预设^[18],澄明思想政治教育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21]37}社会事实。

具体来看,作为社会事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一方面,社会事实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性、普遍性,这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既成性。在此层面上,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产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源于社会需要,随社会演进而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样态,如礼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社会是外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22],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例如,礼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生命更新,成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表现形式。其中,祭祀礼仪不仅以理论教育形式在学校展开,而且家庭也会借助清明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来慎终追远,表达对亲人的怀念,或向祖先祈求庇佑。国家通过设立国家公祭日、拉响“9·18”防空警报等,帮助人们培育家国情怀、凝聚民族精神、增强国防观念。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事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生成性。“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21]135}。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活动。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为其提供实践场域,以便具体把握“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状态与生命历程,进而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构建合乎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社会关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在这一层面,礼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好的示范。礼不仅以社会为育人场域,宴席中的“长幼有序”、婚礼中的“三书六礼”以及各种节庆礼仪都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教化民众,而且以社会为实践中介,人们在内化礼的价值内核后,能够在生活实践中结合地方特色、个人经历,在“由礼成俗”中构建道德日常。

总之,礼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为一种社会事实,帮助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丰富联系,揭示“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域中的五重意义,即背景、本体、对象、中介、视域^[23],使得“社会”成为描述、理解、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

(三)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在当今社会,礼尽管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样态,但依然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因而两者的契合是体系化与贯通性的,礼依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实际上,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本身就是创新,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4]289},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而且,两者的结合本质上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4]14},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因而礼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根脉”与“理论魂脉”融会贯通的重要表现。

由彼此契合到有机结合再到实现创新,是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激活、相互成就的实现机制。由此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既能促进礼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有益经验。一方面,礼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关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知识演化。从纵向看,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样态,其各项内容在中国古代都具有沿革变迁的过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传统礼仪文化逐渐去除封建糟粕,为自身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相应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坚持立足社会、关注社会、解读社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及时调整内容与方式,在适应与促进社会发展中增强实效性、走向现代化。在横向上,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表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本土化阐释,增强其中国特色,而且可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国际交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的有益经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今比较与国际对话中实现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礼“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3]487},融入社会各方面,这启示专门化、组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以日常思维的“通俗逻辑”渗入生活世界,借助社会要素“自下而上”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大思政”育人格局。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聚焦“现实的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与完整生命历程,促使社会成员在处理真实、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自主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

三、实践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

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性贯通于社会发展全程,礼的现代转型也能够方法论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启示。其中,话语内容的创新、与话语对象的对话、传播渠道的拓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完善基本理论,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视角出发,丰富叙事方式,搭建话语载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

(一)创新话语内容体系,提升礼的文化引领力

礼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契合,这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一种寻根的可能,而且也为中国传统礼仪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借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中国社会道德生活形态的演进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和阐释原则^[25]。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一个关于礼的、一贯的、相对稳定的中国叙事,促使传统礼仪文化适应全球化浪潮,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的话语内容。

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第二个结合”中更新中国传统礼仪

的文化形态。“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6]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以维护封建伦理秩序为目的,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中的等级观念和宗教色彩早已失去存在基础。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在继承传统礼仪文化的基本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扬弃封建礼仪糟粕,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在政治价值观教育上,可继承古代以仪式为载体的教化传统,选取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作为新时代政治仪式的象征符号,在“七一”“八一”“十一”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以及革命旧址、纪念场馆、城市广场等特定场域构建仪式时空,引导人们在仪式参与中厚植家国情怀。在此,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也可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思潮中巩固文化主体性,为传统礼仪文化融入国际元素。当前,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尽管本土文化在此表现出强劲韧性,却仍存在过度崇尚西方仪式、弱化本土传统的现象,着装礼仪、宴会习俗、婚礼仪式等日渐西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4]291}当前,“如果我们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27]。面对不同的礼仪文化,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既要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守文化信仰、坚定文化自信,将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融入礼仪文化,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其教化民众、立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又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促使传统礼仪文化兼收并蓄,寻找各国礼仪文化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如尊重、友善、诚信、和谐等,进而在礼仪实践中融入国际元素。比如,拱手礼是中国传统问候礼仪,但在现代交往中,我们则依循国际惯例,更多采用握手礼与鞠躬礼,使得文化的民族性在比较、批判、吸收中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总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应当贯通于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生成于守正创新之中,这要求我们秉持“礼,时为大”^{[9]445}的理念,既继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思想精华,又在此基础上适应社会结构的变革,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文化自信。

(二)实现与话语对象共鸣,增强礼的文化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28]。然而,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在资本逻辑下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礼仪教育呈严重缺失的状态,餐桌礼仪、问候礼仪以及人生礼仪都被简化,许多传统节日的礼俗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假日意识、旅游意识和美食意识。对此,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了脱离日常生活的“悬浮化”局面^[29],人们逐渐形成一种价值观教育只应在学校进行的思维定势,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抗拒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归根到底在于重理论教育而轻实际运用的倾向。但是,意识形态必须表现在日常行为举止中,在具体的行动中发挥其实际价值。这也正是称中国为“礼仪之邦”而非“礼义之邦”的原因之一,礼义的营养来源于具体的履行^[3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的语境下,要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就必须实现与话语对象,即“现实的个人”的对话。首先,要继承并发扬礼在传统教化中的具身

性、体验性,以日常生活场景为育人空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1]“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32]等道德规范,都遵循“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但礼仪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封建社会对礼仪更多强调的是遵从,多数人对其中的礼义只是“知其然”而非“知其所以然”,主观能动性受到压制,最终造成“礼教吃人”的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重视礼仪的意识形态内核,促使人们达到身心在场的仪式自觉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的价值引领下不断反思,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实现“明体”与“达用”的辩证统一。其次,礼仪用语也需贴近生活。语言是礼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桥梁。我们需要放弃一些概念性的框架,避免话语之间不必要的逻辑推演,结合生活经验重塑关于礼的语言表达,跨越理论知识与真实社会之间的缝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形成沟通性。教育者不妨扮演乡绅的角色,用“现实的个人”描述生活的语言,以叙述的方式,把多数人生活在其中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讲清楚。再次,礼仪与礼俗的双向互动十分必要。李安宅^[33]认为,礼的起源,自于人情。“礼”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是社会的产物,是因时代、地域、生活条件上的不同而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礼仪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即礼必须结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风俗展开,不能只遵照统一标准机械地进行。其中,礼生是重要载体,他们是民间具有文化知识、精通礼仪程式、具体操办各类仪式的乡村知识人,师徒授受,代代相沿,成为一方乡里举办礼仪的熟手^[34]。尽管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礼生,但这一角色大多已经商业化、职业化,变成了专业代哭队、婚庆或殡葬一条龙服务,丧失了其原本的文化教育意义。

(三)拓宽话语传播渠道,释放礼的文化辐射力

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即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入侵、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多元化等多次冲击,依然坚持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表现出“不断裂”的韧性状态与强大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将礼仪文化视为一种传播活动,即儒家利用“礼乐”的传播形式将自身关于宇宙自然、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等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生存智慧、处世规则等向普罗大众广泛传播^[35]。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继续发挥礼仪文化的传播力与辐射力,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首先,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36],为礼仪文化的传播指引方向。在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在传播中广泛吸收儒家、道家、佛家等多个学派的思想,倡导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风民俗的融合发展。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今天,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频繁和紧密,礼仪文化只有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礼仪文化进行交流、合作与互鉴,才能够更好地拓展文化视野、坚守文化信仰,在吸纳人类礼仪文明成果和时代精华中丰富中国传统礼仪的内容与形式,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中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次,丰富话语叙事方式,扩大礼仪文化的传播广度。传统社会常常借助“乐”来进行情感表达、传播礼义精神,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5]723},礼与乐是感性 with 理性、形式与内容的并行关系,由此构成礼乐互补的话语表达方式。基于此,乐或许可被视作礼的叙事方式,将礼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形象化,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据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的话语表达也可以利用话剧、电影、电视、美术、摄影等艺术形式进行情景化呈现、通俗化解读,通过构建故事世界,更加立体地展现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实现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再次,借助新兴技术创新话语载体,增加礼仪文化的传播强度。我们可以充分发挥

数字时代的传播优势,依托VR、推荐算法、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打造沉浸式的礼仪体验场景,让社会成员切身感知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更准确地理解礼所宣扬的伦理精神,从而巩固文化主体性,摆脱西方叙事的影响,在实践互动与情感共振中自觉参与到现实道德实践中,并在处理多样的利益关系中自主构建价值体系,促进礼的现代转型。

综上,礼不仅具有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呈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样态与样貌,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为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能够引导人们深入实践,在社会结构中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把握其与社会之间的丰富联系,使得“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在描述、理解的基础上,礼也可以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但也需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话语体系只能基于一种理想化图景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启示,而无法给出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因而,要想更好地阐释传统礼仪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依然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进行调研,以便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注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核的礼一定能够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宜蓬.从礼器到礼教:礼乐文化推衍的内在逻辑[J].孔子研究,2014(4):91-97.
- [2]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 [3] 礼记:上[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 [4] 周礼:上[M].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404.
- [5] 礼记:下[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7] 荀况.荀子[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 [8] 钱玄.三礼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
- [9] 高微征,刘毓庆.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与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23,43(5):73-80.
- [10] 胡芮.由礼成俗: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民间化与生活化[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8(3):93-104.
- [11] 安作璋.郑玄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629.
- [12] 吴丽娱.礼与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
- [13] 丁鼎.“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J].齐鲁学刊,2007(4):13-15.
- [14]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蓝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
- [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8:65.
-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 [18] 叶方兴.论思想政治教育引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视域[J].青年学报,2022(6):55-61.
- [19] 孙其昂,叶方兴.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4):8-11.
- [20] 陈艳波,丁玲.事情本身的实践还原:马克思辩证法的现象学意蕴[J].理论学刊,2024(4):75-83.
- [21]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7.
- [23] 叶方兴.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社会”向度[J].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117-129.
-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25] 胡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历史演进与伦理价值[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6(3): 14-22.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9.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88.
- [2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65.
- [29] 叶方兴. 从“悬浮”走向“融合”: 论现代性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J]. 探索, 2019(6): 152-159.
- [30] 许建良. “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的是正[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2(3): 24-34.
-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1.
- [32]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M]. 李逸安, 张立敏,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80-187.
- [33] 李安宅.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3-10.
- [34] 杨华. 中国何以成为“礼仪之邦”[J]. 江汉论坛, 2020(1): 97-104.
- [35] 刘金波. 兼性: 礼乐文化传播的中国智慧研究[J]. 理论月刊, 2021(8): 144-150.
- [36] 习近平.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08.

The Historical Basi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way of Etiquette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 Yuhan, ZH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long been renowned as a state of etiquette and propriety, where etiquette stands 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etiquette encompasses moral standards, social systems, ethical values, etc., which aligns inherentl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an indispensable education approach and principle in ancient China. Moreover, etiquette has distinct social attributes, 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ontological proposition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ts essence is social practice, tracing it back to its roots.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it is a social reality, with the profound links between it and society. Society has thus become a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etiquette can be integrated with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stering a new cultural form, viz.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etiquet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etiquette culture; soci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etiquet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陈济平〕